



■创作谈

请听我来说小说

□崔道怡

“凡是志于创作的青年，第一个想到的问题，大概总是‘应该怎样写？’现在市场上陈列着的‘小说作法’、‘小说章程’之类，就是专门掏这类青年的腰包的。然而，好像没有从‘小说作法’学出来的作者，我们至今没有听到过。鲁迅曾经告诫，‘创作是并没有什么秘诀，能够交头接耳，一句话就传授给另一个的，倘不然，只要有这秘诀，就真可以登广告，收学费，开一个三天包成文豪学校了。’

诚哉斯言。尽管我这‘三十六讲’并非‘小说作法’之类，然而效用是一样的：即便上过‘小说课堂’，也未必就会写小说。否则，我本人早应该成为小说家了。而我虽也曾发表过小说，却一直是一名文学编辑。文学是要先天禀赋灵气、后天花费力气，常能遭遇运气的事业，我缺乏这方面的素质和机遇。我的工作职责在审美；鉴别、判断创美活动的成敗得失、品位高低。相对创美而言，审美讲求的是‘规矩’。

“诗贵性情，亦须论法。”清代文人沈德潜指出，“然所谓法者，行所不得不行，止所不得不止，而起伏照应，承接转换，自神明变化于其中。若泥定此处应如何，彼处应如何，不以意运法，转以意从法，则死法也。”章学诚则说得更明确：“学文之事，可授受者，规矩方圆；其不可授受者，心营意造。”文无定法，而有“规矩”，那是一切文学作品都应具备的共同之点。我所讲的，就是这种“可授受”的“规矩”。

作为职业读者，我是怎样审阅小说的？小说成果的优良中劣，我是如何评判的？若把小说比做园林，我便是它的“导游”。对初进景点的“游客”，“导游”或许有助于指点“门径”。我按照我的理解，向你指出各处景点的特色。即便你已登堂入室，是不是也愿意听一听我这个审美者的个人体会和经验呢？既然你已翻开此卷，那么就请跟随我来，我将说给你听——“小说是‘看’出来的”，“她的眼睛会说话”……

时间像一条没有尽头的长线，把村庄和村庄里一代一代的人串起来，于是就有了后人讲述不完的历史。

一个家族的背后是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的背后是一个乡、一个县，乃至一个国家。面对或将被宏大历史淹没的家族，面对这个家族曾经走过沧桑变迁的岁月，为了记住这个家族和我们民族的惨痛波折而又光荣辉煌的历史，于是就有了这本书。

吕双辉是深圳的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他的家乡涂岭镇是福建省惠安县唯一的革命老区，而他出生的路口庄是老区的一个基点村。他家的祖宅曾经是党的地下交通站。他的爷爷吕好成16岁闯厦门，在那里加入了工会组织，参加过“五四”运动的游行和集会，是在“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革命青年。吕好成还参加过攻打“台湾公馆”和“会审公堂”的活动，震惊中外的“厦门劫狱”也有他的身影。1930年，吕好成又在家乡参加了福建惠安工农红军，参与组建农会、农民夜校、妇女会，组织“抗捐拒匪”、“惠安暴动”等活动。他的奶奶黄宝是党的地下交通员，

平民也有传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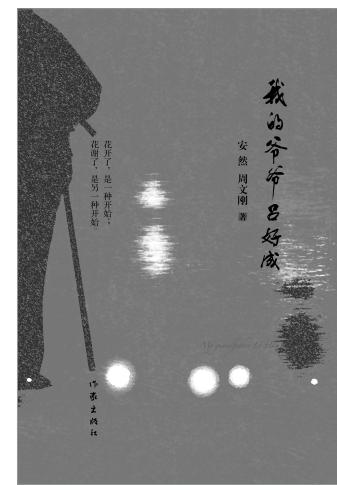
□安 然

经常为地下党组织递送情报。2007年10月25日，中央电视台《夕阳红》栏目以《百岁勋章》为题，介绍了他爷爷吕好成和他奶奶黄宝的传奇故事。

吕好成出生在清末民初，是中国伟人辈出思想激荡的年代。有志青年纷纷加入救国救民的行列。吕好成也不例外，他和他的童年伙伴、少年朋友苏法全、陈平山、陈兴桂、吴敦仁等参加了许多爱国运动。后来，他的几个朋友相继牺牲，只有他和陈兴桂活了下来，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之中。然而，在“土改”运动中，吕好成被打成“封建头子”而惨遭迫害。他的童年伙伴陈兴桂为他伸冤，也被打倒。

翻开涂岭的历史，在大革命时期，涂岭人民可以说家家有红军，户户有农会会员，百分之九十的青壮年都参加了农会和工农红军。

我出生在福建闽北，小时



候听老人讲了不少当地百姓参加革命的故事，闽北、闽西都是革命老区，许多老区人民为中国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据史料记载，湘江之战，六千闽西子弟兵血染疆场，前去投入革命的闽西子弟大多只有十七八岁。他们有的

是在放牛，有的是在耕田，看见红军队伍来了，放下鞭子和农具，赤着双脚，穿着褴褛的衣裳直接加入了红军队伍，甚至来不及跟亲人告别。后来很多人牺牲了，连名字也没能留下来。

吕双辉说起这些英雄前辈时，情绪激动。他恳切地对我说：“你是作家，又是福建人，我恳请你为故乡的这些英雄写一本书，让我们的子孙后代记住他们。”

从《涂岭革命史》中，我了解到：泉港区（原惠安县）涂岭镇是革命老区，从播撒红色火种到全国解放，吕好成、陈平山、苏法全、吴敦仁等许多革命者为了自由和解放，前仆后继、浴血奋战，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光辉历史，他们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也是后人的榜样。

在我的爷爷吕好成》这本书里，我们根据有关史料和民间传说，塑造了吕好成这个人物，他是闽南的一个普通平民，又是八闽儿女中的一位杰出代表。通过这本书，我们把曾经发生在这片历史天空下的，或曲折、或隽永、或艰辛的故事，记录下来，留给后人。

《天墨》：
张扬文化的力量

□石一宁

雪静的长篇小说《天墨》，虽是从地域文化、地域风情人手，以比较传统和通俗的夺宝、寻宝母题为结构框架，却展现了一个很大的创作企图或曰雄心抱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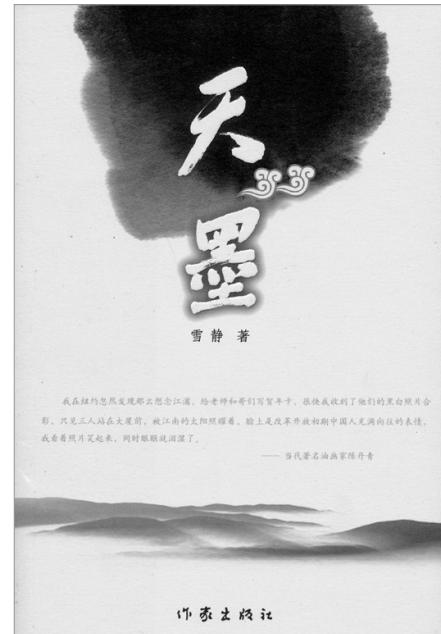
首先，它是以当代书画大师林散之的生活以及作品为背景，表现男主人公龙池的家乡天浦县，也就是现实中的江浦县，如今的南京市浦口区江浦地区的风土人情尤其是文化风貌。小说中的天浦县，文化气息浓郁，地域风情鲜明。天浦县的历史、人文、地理，天浦县方方面面的风俗民俗，包括婚嫁、饮食等等，所谓“好看的，好吃的”，作品中都有所涉及和描述。小说以众多生动的历史传说、诗词民谣、禅语对联，表现天浦县厚重的文化底蕴；而又通过这种文化底蕴，表现天浦县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人。表现天浦人的历史身影，也表现天浦人的现实形象。在某种程度上，这部小说与其说是写三两个或四五个有名有姓的天浦人，不如说它写的是整体的天浦人，是天浦人的整体形象。作者显然有给天浦县、天浦人树碑立传的意识，有给现实中的江浦地区扬名立信的心愿。作者虽然不是江浦人，甚至不是南方人，但在南京工作多年，对江浦地域文化显然十分了解，亦十分钟情。阅读这部作品，令人感到小说中所写的天浦县是一个颇具魅力与吸引力之地，使人顿生一游现实中的江浦，看那里的林散之纪念馆、看那里的山川林海、看那里的文化风情之想。

并非所有小说都一定具有充分的文学性，尤其是有人物与地域原型、有一定真人真事依据的小说。不少作者受到真人真事的拘束，素材的丰繁与生活的真实反而成为创作的掣肘和拖累。但《天墨》的作者比较注意规避这种弊端，不因为生活的真相而削弱和淡化文学性。小说虽然以江浦地区为背景，但小说称为天浦县；虽然以林散之为人物原型，但小说称为木月文，似真似幻，像实像虚，比较出色地处理了真实与虚构的关系，让叙事保持着一种灵动跌宕的状态，从而使作品获得更大的审美空间和审美张力。

小说通过书画大师木月文的艺术生涯及其作品的解读，通过对天浦县文化现状或曰生态的描写，进而扩展为一种普遍性、普世性的思索，这就是对中国传统

文化在当代的命运、文化在现实中的力量等等方面问题的思考。天浦人由于木月文这一榜样的引领和影响，很有文化修养和艺术品位，很多人能吟诗作对、泼墨挥毫，甚至一些老板也向往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很多人做生意也是经营字画。或许作者写的是江浦地区的真实情景，但作为小说，读者不妨把这些描写视为艺术意象和隐喻。读到作品中的这些描写，我很自然地想起了历史上西方一些思想家和作家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赞美。如20世纪上半叶的英国作家威尔斯说：“中国产生了大量美丽的艺术，一些优美的诗歌，令人惊叹的烹调法和世代相传几亿人民的光辉愉快的生活。”英国哲学家、思想家罗素在完成9个月的中国之行后，于1922年写了《中国问题》一书，在书中他认为，中国人摸索出的生活方式已沿袭数千年，有理由被世界采纳。

当然，西方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有各种各样的评论，我们不必完全被这些评论所左右。然而，西方一些有识之士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评价应当引起我们重视。文化是人类生活的本质。之



寓意奇诡中的优雅端庄

——读雪静长篇小说《天墨》 □谭 高

女作家雪静的第12部长篇小说《天墨》日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品写《世界经济早报》记者龙池，无意间在香港苏富比拍卖行发现了当代草圣木月文的《秀春图》，这使他十分诧异：自己家里明明有妈妈的戏迷木月文亲手送的《秀春图》啊！为了证实家里《秀春图》的真伪，他立刻乘飞机飞往老家天浦县。在飞机上与人类行为学博士、日本东京新闻社女记者田中樱子相遇，她竟然也是为《秀春图》而来！回到家中后，龙池发现画已被妈妈廉价卖给了一个房地产生人。幸而《秀春图》还在，于是一场藏宝与寻宝的较量开始了……

作品以寻找追索一幅《秀春图》的画为线索，将天浦的人文风物及二战期间日军在中国天浦的掠夺呈现给读者，以一幅丰富庞大的小说画面还原历史瞬间。其中既有为保护国宝而不惜金钱的中国记者和诸多性格品不一的文人墨客，又有日本人类行为学博士、奸诈好色的菲律宾海盗商人、代表日本右翼财团利益的反华青年、香港大玩家、拍卖行的拍卖师，还有隐在故事背后的日本前政要……作品两条线索并驾齐驱，构思奇诡，故事中暗藏故事，叙述优雅。

21世纪以来，诸如“环境”、“道德”、

所以认为雪静在《天墨》这部长篇中展现了一种雄心大志，是因为她在思考文化问题。而且她不只是思考小说中的天浦县或者现实中的江浦地域的文化问题，也不只是思考中国的文化问题，而是思考文化与整个人类的生活的关系问题。天浦的人文面貌只是一个隐喻，只是一个思考的原点，作者是以天浦为基点展开更为广阔的世界图像的，所以她以一条木月文的书画的线索，把天浦置放于国际性的视野，或者说把天浦和世界联系起来，从而进入到包括艺术在内的文化与人生、文化与和平、文化与人类幸福的关系的思辨。

作品也写了现实的败坏，写了人心的险恶，并通过菲律宾商人、田中樱子的男友这两个人物，表现了人性中根深蒂固的贪婪、野蛮和兽性，但作者相信艺术的永恒、文化的力量。小说所塑造的女主人公田中樱子，是一个有着理想主义色彩的人物，为了要将木月文的力作归还中国，她不惜与男友断交，卖掉住房，甚至身体遭受凌辱。她既然是为了完成叔叔田中角荣的遗愿，同时也是因为她具有一种高贵的文化理想。实际上，她对男主人公、中国青年龙池的感化和吸引，并不仅仅是美貌和异性的魅力，而更是她所具有的这种理想主义。

《天墨》的内涵很丰富，其所包含的思辨是多向度、多层次的，如它通过对争取木月文作品回归天浦的描写，既肯定了这一行动本身所蕴含的爱国主义意义，也通过书中人物的语言，质疑这一行动的必要性。如小说中的虾城老板朱大龙说：“木月文的字画能在地球上存在，不管它在哪里都有独特的价值。文化最具侵略性，让我们的国宝去感染世界，不好吗？”这位老板还以为把一个人的字画价格抬得太高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因为“金钱是洪水猛兽，驯服不好是容易出事情的”。这些话语亦可谓作者的自我怀疑与反思，读来颇耐人寻味。

此外，这部小说涉及了中日关系的重大问题，还有关于男女两性关系的深入思索。田中樱子对性的态度、对贞洁的取舍，都很触动读者的心弦。中日关系、两性关系的心理学与行为学，以及女权主义等等，从这些层面面对这部小说进行分析，亦能生发出长长的话题。头绪众多、意义纷呈，《天墨》可谓一部集合了多种视角和声音的作品。

当然，《天墨》于小说本体方面亦非无可议之处。比如，其情节性不足。小说前面大半部都是对天浦县人文和地理的展示，但其中缺少人物的行动。或者说主人公只是像游客那样走马观花、蜻蜓点水般地行动，这样的行动缺少细节，也缺少变化，构不成生动的情节。作者更多的是通过思辨和对话来塑造人物的性格，而没有较紧密地结合人物的行动一起来刻画。同时，过多的与过于直白的思辨和对话也多少影响了小说艺术的圆融。

作为女性作者，我更了解和体恤女性细腻丰富的内心世界，我的作品一直都在关注女性，无论居住地是城市还是乡村，无论文化程度是高还是低，无论年龄是老还是少……几乎各个层面的女性都能在我的作品中找到她们的身影，并通过阅读，感受她们坚忍善良的美好品质。

女性肩负的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让她们赢得了社会的尊重。最近几年，随着对社会了解的逐步深入，我开始关注官场女性，她们在官场的生存状态和情感困扰引起了我的思考，从对事业的

追求、责任的担当、对婚姻的维护、对情感的取舍，让我们看到官场女性的知性、优雅、内敛和坚强，也使她们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中显得更加自重自爱，独立从容，成熟美丽。于是便有了长篇小说《女人画》的构想。

这一层面的女性就在我身边。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感知，依稀可见她们的喜怒哀乐，还有迷茫、疲惫和无奈。我想，我该为她们说点什么。官场女性生活在巨大的压力之中，需要社会和家庭的信任、理解、支持和关怀。而强势的男性拼搏官场职场，不只是靠智慧、靠能力，还要克服交往中性别因素的诸多不便，还要承担家庭赡养老幼的重担，偶尔还会遇到嫉妒、猜疑、报复、谣言等等的困扰……就这样一个大的环境和状态，好强的女性若能独立担当、顺利晋升、赢得尊重，实现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需要付出艰辛和努力，也要承受打击和委屈！更传统偏见认为，女性的出人头地，大多

利用了性别优势，抹杀了女性巾帼不让须眉的个人实体价值，亵渎了女性的美丽高洁。而现实中，女性在官场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容忽视，她们细致周密，有耐力有情趣，干练优雅，不甘人后，她们知性、自爱、内敛、独立、果敢、坚忍、善良……是官场中不可或缺的靓丽风景，是社会进步中不可低估的推动力量。

大多数读者会认为官场小说就是反腐小说。其中，如有女性出现，必有权色交易，这样的情节和结局一定在读者的设想之中。《女人画》力图颠覆读者对官场小说的通常理解和陈旧意识，颠覆女性就是献媚甚至是献身的偏见。

小说中三个官场女性由于不同的性格、不同的人生际遇，演绎出了不同的官场和情感故事。对事业的追求、对责任的担当、对婚姻的困惑、对情感的取舍，使她们在残酷的现实中更加自重自爱，成熟美丽。

我希望通过《女人画》的诠释，使读者对官场和职场女性有新的认识，希望社会更加关注和尊重女性，理解和支持女性。这也是我写作《女人画》的初衷。

